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

礼仪与兴象

《礼记》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

□ 王秀臣/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

礼仪与兴象

《礼记》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

□ 王秀臣/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(11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礼仪与兴象:《礼记》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/王秀臣著.
—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3.4
(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)
ISBN 978-7-5097-5722-2

I. ①礼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礼仪-中国-古代
②《礼记》-古典文学研究 IV. ①K892.9 ②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9963 号



礼仪与兴象

——《礼记》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

著 者 / 王秀臣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

邮政编码 / 100029

责任部门 / 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电子信箱 / renwen@ssap.cn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 张倩鄂

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9

读者服务 / 读者服务中心 (010) 59367028

责任编辑 / 张倩鄂

责任校对 / 陈 磊

责任印制 / 岳 阳

印 装 /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版 次 /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097-5722-2

定 价 / 79.00 元

印 张 / 19.75

字 数 / 299 千字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▲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《礼记》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”

(批准号: 07BZW017)

出版前言

文学研究所学术文库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的郑重推荐，将逐年推出本所学者以青年为主体的新作。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有“博士文库”、“青年文库”，这个文库更多的是留下他们在“青年”、“博士”之后继续前行的足迹。基于建所重在出人才、出成果的思路，期待着这里能涌现出一批将来的名家的今日之名作。

自1953年建所以来，我们就执著地追求谦虚、刻苦、实事求是的所风，力戒浮躁，崇尚有根底的创新。创新而无根底，易成泡沫；讲根底而欠创新，易成老木疙瘩；创新与根底并重，才是我们增长实力、开拓新境的基本方法。文学所一代学者的成长，都在实践着这一基本方法，避免了追波逐流或攻关抢滩之弊，培养了一批为中国现代人文建设做着实实在在工作的学人。如果要我不那么谦虚地说一说文学所的长处，这长处就在于从前代学者就开始了的文献功夫和贯通意识，以文献站稳脚跟，以贯通迈开脚步，以新材料、新思维、新发现，走向现代学术的深处、广处和前沿。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以殷切的眼光期待，期待这个学术文库成为文学所的学风、学养和学术基本方法的历史见证。有期待的写作与有期待的阅读，其可成为人生之乐事乎？

走进新纪元的文学研究所，总要有一种与我们民族全面振兴相适应的文化姿态和文化行为。小康社会应有学术文化的“小康”。文学所近期正在启动三项学术工程：其一是这套“学术文库”，主要收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的新作，代表着我们的希望。其二是“文学研究所集刊”，重点发现本所学者见工夫、有分量的长篇论文，展示我们的学术阵容和实力。其三是“文

学研究所学术汇刊”，重新汇集出版本所在 1950 年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史文献，包括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”、“古典文艺理论译丛”、“现代文艺理论译丛”以及“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”，还准备选刊一批重要学者的名作精品，这反映着我们应该继承弘扬的传统和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。文学所和它的学术委员会愿为这些学术工程付出不懈的努力，以开辟文学研究的广阔的途径和富有生气的新境界。谨请学术界高明之士和新锐之友不吝赐教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
学术委员会主任 研究员
杨 义
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六日

摘 要

《礼记》文字精微，句法巧妙，章法考究，汇群经之总义，集儒家思想之大成，其文本特征、思想意蕴具有文学文本示范意义和元文学理论意义。礼仪中有“兴”也有“象”，礼仪之“兴象”是诗歌“兴象”理论的实践来源和理论来源。祭祀礼仪具有象征性，祭祀的象征与文学的象征互相通融。礼仪称谓使古代修辞实践从语辞走向文辞，开启了修辞的文艺性发展路径，语言因此也具备了文艺性审美功能。因礼仪之需而产生的“文言”具有仪式和文学双重属性，追求对语言文饰的“文言”是真正意义上语言艺术的开始。诗、乐同源，中国古代诗学实源于乐论，乐论是古老的哲学，也是原始的诗论。

序

李炳海

王秀臣博士的新作《礼仪与兴象——〈礼记〉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》即将出版，嘱予作序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乐事。一是先睹为快，可以提前通读全书，成为这部著作的首批读者；二是可以借此机会略陈己见，表达对一些问题的看法。该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优秀成果，学术亮点颇多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这里所陈述的一得之见，不敢有他山之石的期待，但不乏切磋琢磨的学术乐趣。

书名定为《礼仪与兴象——〈礼记〉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》，顾名思义，这部书是从经学与文学的关联切入加以探讨，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当下的国学热。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，一些高等院校陆续建立国学研究院、国学院、国学研究中心等机构。弘扬国学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的重要走势，并且至今方兴未艾，呈现出风起云涌、波澜壮阔的景观。毋庸讳言，这场国学热对于弘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很大程度上是对以往否定传统文化做法的反拨。可是，国学热能否持久？它是否会像已经成为历史的某些运动那样一哄而起，一哄而散？这确实是发人深思，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。要使国学真正得到复兴，首先是要对它做出科学的界定，其次是要有切实可行的运作方式。

何谓国学？学界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，与前些年对于文化所下定义名目繁多的情况有些类似。经过近些年的思索和实践，人们逐渐达成比较普遍的共识，认为国学应以经学为核心，经学是国学的基础。而在传世的经学著作中，十三经最具权威性。离开十三经而谈国学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在十三经中，礼经占了三部，即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。从当下的情况来看，真正以“三礼”为切入点去研究国学者，尚是学术的薄弱环节。追究其中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，认为这三部礼经不是先秦时期的古文献。以秀臣博士这部著作的主要研究对象《礼记》而言，虽然西晋陈劭已经指出这部书是戴圣删古礼而成，但是，许多学人仍然不承认它保存的是先秦文献。《礼记》有《乐记》，古注已指明是先秦公孙尼子所作，然而，不少人却认为这部论著是对《荀子·乐论》的抄录。《礼记》有《三年问》，与《荀子·礼论》多有相同之处，由此而来，有些人又认为《荀子·礼论》在前，而《礼记·三年问》出自汉儒之手，是对《荀子·礼论》的传抄。类似说法，直到当下仍然不时可以见到。近些年来，随着出土文献数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，礼经是先秦文献的看法得到了众多证据的支撑，因此，对礼经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人们开始走出疑古的时代，以客观的态度审视这类文献的价值。对于《礼记》中的众多专论，陈桐生教授认为出自七十子后学之手，是先秦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，持论公允，颇有启示意义。秀臣博士对于礼经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没有受到疑古思潮的干扰。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《三礼用诗考论》，明确地把三部礼经作为先秦文献加以处理，并且取得众多学术成果。这部新作则是把《礼记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，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保持了连续性。二者相衔接，构成他从礼经切入研究国学的格局和体系，并且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可供继续拓展。秀臣博士的这两部著作，对于当下的国学研究和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国学如果抛开礼经，要么成为纯思想方面的传承，要么沦为形而下层面的技艺的演示。而从礼经切入弘扬国学，则必然涉及思想观念、社会制度、礼仪伦理等诸多领域，有利于展示国学的精英文化属性和它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。就此而言，秀臣博士的这两部著作，虽然没有以弘扬国学的名义进行标榜，却代表了国学研究的正确方向。

二

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原型是在先秦时期生成的，这些原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原始基因，在后代文学中不断地复现。因此，对先秦文学的研究，必须重视原型的发掘，否则，就会流于普泛化的描述，而忽略了应该关注的重点对象。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定名为《礼仪与兴象——〈礼记〉元文学理论形态研究》，所谓的“元”指的就是原始的开端、本原，是把探讨古代文学理论原型的生成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，可谓切中要害，把握住了问题的根本。本书在对文学理论原型进行发掘、认定的过程中，所采用的方法也多有可取之处。

按照传统文学理论的说法，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概括，文学理论是文学活动的产物，用这种思维模式去审视先秦文学及早期文学理论，会出现众多的扞格不入之处，无法圆通。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没有采用惯见的思维模式，而是从先秦时期的礼仪切入，追寻各种文学观念的最初生成。礼仪尚敬，由此生成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命题。礼辞尚文，由此衍生出所谓“文言”。这类案例的系统梳理向人们表明，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许多命题、主张，并不是从纯粹的文学活动中生成的，而是以多种礼仪为母体，是由政治命题、宗教命题、道德命题演变成文学命题。该书导论援引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先生的论述，指出“文”这个概念原始内涵的丰富性，以及它与礼仪的关联，是颇为可取的。其实，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许多重要范畴和主张，都与礼仪密不可分。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审美范畴是文、美、丽。“文”这个范畴生成于礼仪，“美”和“丽”同样如此。“物相杂，故曰文”，这是《周易·系辞下》对于“文”所作的概括，是以物相错杂为美。这种表述在《礼记·礼器》中也可以见到：“礼有以文为贵者，天子龙衮，诸侯黼，大夫黻，士玄衣纁裳。”这里列举的是四个等级的服装，均是不同的色彩相错杂，而不是单一的色彩，从以文为贵到以文为美，就是由礼仪命题演变为文学、美学命题。再如美学，或释为羊大为美，或释为人大为美，而无论哪种解释，都无法割断它

与礼仪的关联。祭祀强调“牺牲肥腍”，要把最肥美的牛、羊、豚用作祭品，羊大为美观念体现于祭祀。认为人大为美，把美字的构形说成是在人的头部增羽饰之形，显然，这是礼仪的需要。古代所说的“丽”，是“人多为美”，到了《文心雕龙·丽辞》篇，明确提出“奇偶适变”“迭用奇偶”的主张。这种文论主张的原型，在先秦礼经中也可以见到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称：“鼎、俎奇而筯、豆偶，阴阳之义也。”祭祀器具数量的奇偶相对，已经是后代文论丽辞主张的胚胎。总之，把中国古代元文学理论形态置于礼仪网络中加以考察，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，可以取得一系列理论上的突破。

无论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，还是梳理古代文学思想，惯见的做法是从内容切入，由内容而论及形式，重思想内容而轻表现形式的倾向始终未能得到根本的扭转，许多人已经是轻车熟路。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不是驾轻就熟，而是另辟蹊径；不是由内容到形式，而是从形式入手加以剖析。《礼记·礼器》称“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”，礼的仪式繁复至极，为这种考察方式提供了便利。第一章仪礼与兴象关系的论述，就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。文中列举《士冠礼》《士昏礼》《乡饮酒礼》等多种礼仪中“兴”的动作，指出《仪礼》中三百余次的“兴”，表示的都是起的动作。古文字研究表明，“兴”字的构形是众人抬鼎，是抬起之义，与秀臣博士对《仪礼》“兴”字所作的辨析结论相同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。如果对《仪礼》的上述材料进一步加以梳理，还会发现“兴”的动作在礼仪中绝大多数不是靠前，而是居后，在它之前还有其他动作。这样一来，“兴”的动作在礼仪中的作用就显而易见，文学作品中“兴”与“比”的差异也就容易辨析清楚。“兴”是表示礼仪的渐进性、间隔性，而不是一次完成。这种渐进性是礼仪的基本规则。《礼记·礼器》写道：“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，必先有事于禘宫；晋人将有事于河，必先有事于恶池；齐人将有事于泰山，必先有事于配林。”这里体现的正是礼仪的渐进性、间隔性。从这个视角去考察文学作品中的“比”和“兴”，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不在于是否借助外物加以表现，而是在于如何表现。“兴”的表现方式是渐进的，前后是有间隔的；“比”的表现方式则是直接的，即成的。

这部书第五章第一节对《大武》歌舞的考察，也是从歌舞的程序、形态入手，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以阐释。如果进一步加以辨析就会涉及结构形态的规则。《大武》歌舞共六成，其中第一成是表演者在舞台上的等待期，第六成是表演者集合，返回原位。《大武》歌舞的主体部分是四成，第一和第六成分别是序幕和尾声。把握住《大武》歌舞的这种形态特征，可以发现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型，即以四为基本单位的规则。《诗经》的四句成章，辞赋叙事的四段铺陈模式，以及后来近体诗、八股文的起承转合，都可以从《大武》歌舞的结构形态中找到原型。总之，从礼仪中追寻文学的原型，这部著作所做的开拓是多方面的，所采用的方法也颇为独特。

三

黑格尔在《美学》第三卷把艺术风格划分为三种：严峻的、理想的、愉快的。其中严峻风格采用的是象征性的表现形式，黑格尔把人类早期艺术归入这个类别。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先秦文学确实属于严峻型，采用的是象征性的表现方式。神话的暗示，《周易》卦、爻辞的隐语，《诗经》的比、兴，史传文学的春秋笔法，诸子寓言的借外论之，楚辞的连类譬喻，都属于象征性的表现形式。因此，对于先秦文学的研究，如果未能进入它的象征世界，那么，所做的只能是现象的描述，而无法揭示出它的本质。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，对于礼仪的象征性予以高度关注，用很大的篇幅予以专门论述。第一章礼仪与兴象，提到礼仪的行为象征、语体象征、器物象征。第二章的祭祀与象征，涉及祭祀礼仪的象征系统，其中包括祭器、祭品、服饰、时空、仪节等诸多因素，并且指出象征性表现方式具有沟通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功能。第三章的称谓与修辞，则是从称谓切入，指出各种名称所具有的象征性，以及这种象征性表述方式的生成机制。对于礼仪的象征性做如此深入系统的梳理，在此前同类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，这是该著作的一大亮点。

秀臣博士对礼仪象征性所做的归纳论述，遵循着这部著作本身内在的

逻辑。如前所述，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，是往往从对形式的观照入手，关于“兴”的生成就是以梳理礼仪形式发端。从形式切入又不停留于表面形态，进一步探讨形式所蕴含的意味，由此便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对礼仪象征性的论述。所谓的象征属于修辞学，称谓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联，又以名实之辩为依托。这样一来，就把称谓象征与名实之辩整合在一起，体现出逻辑上的严密和清晰。

《礼记》一书主要是对各种礼仪进行解说，它对礼仪象征性所做的阐释是中国古代象征理论的元形态，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权威性。抛开《礼记》的这些论述，无法找到中国古代象征理论的全部源头，也不可能把它的生成机制还原出来。以称谓象征为例，这些称谓均取自指称对象本身，或是象声，或是拟态，或是取自角色担当，或是取自它所具有的功能，均具有现实依据，而不是出自想象。至于器物象征，同样是以多种方式生成的，并且有客观背景。《礼记》后来成为儒家经典，因此，它对礼仪各种因素象征意义所做的提示，在古代具有权威性，许多事物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保持稳定型，甚至一以贯之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写道：“龟为前列，先知也。以钟次之，以和居参之也。虎豹之皮，示服猛也。束帛加璧，往德也。”龟象征智慧，钟象征和谐，虎豹象征勇猛，玉象征德，礼仪所用之物的这些象征意义已经积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，成为表达固定意义的符号。

先秦文学的象征性表现在一系列作品中是成系列的，探讨象征性表现方式的历史生成，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。对于先秦文学象征性表现方式的生成，古人主要关注的是《周易》及相关文学作品，近代学者则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神话的解谜方面。探讨先秦文学象征性表现方式的历史生成，是一项颇具吸引力的课题，类似于破案解谜。可是，这项工作又存在较大的风险，稍一疏忽就会流于牵强附会，主观臆断。秀臣博士这部著作对于礼仪象征性所做的梳理深入而充分，同时又言之有据，持之有故，没有出现常见的流弊。就此而论，书的作者以礼仪为研究对象，确实保持着礼经的理性精神。

四

《礼记》作为解说礼仪的著作，涉及的内容异常丰富。它不但从制度、伦理、宇宙精神层面解说各种礼仪的合理性，而且还把礼仪纳入五行说体系，从哲学角度论述礼仪的生成根据。由此而来，探讨《礼记》元文学理论形态如果疏离作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五行说，那么，所做的探讨就无法提到形而上的高度，难以具有鲜明的理论思辨色彩。秀臣博士这部著作第五章最后一节的《“声亦如味”与“诗味论”的形成》，就是从礼仪与五行说关联的角度加以论述，从而使得全书形成合理的结构和完整的体系。

这部著作对于先秦文献与五行说相关的材料做了系统的梳理，把“声亦如味”说的历史生成置于五行说体系加以考察，得出的结论进一步印证了钱钟书先生的通感说。如果进一步深入探索还会发现，“声亦如味”命题不仅是通感的产物，而且与“味”在古人观念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写道：“若视听不和，而有震眩，则味入不精，不精则气佚，气佚则不和。”这是从赏乐和养生的角度立论，认为味和气密切关联，味直接影响到气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也写道：“天食人以五气，地食人以五味。五气入鼻，藏于心肺，上使五色修明，音声能彰。五味入口，藏于肠胃，味有所藏，以养五气。”这是从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论述气和味的关联。在古人观念中，气是生命力的载体，味则是气的主要养护者，二者密不可分。对于人的自然生命而言，味是仅次于气的重要因素，反映的是民以食为天的朴素理念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记载，郑子产论述礼的起源时说道：“气为五味，发为五色，章为五声。”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也称：“天有六色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征为五声。”在当时人的观念中，气是生成事物的本原，味则是派生具体事物的亚原。先是由气生出味，又由味生出声音、色彩等具体存在物。这样一来，味就处于宇宙生成链条的前端，仅次于气，因此，人们对于味也就予以格外的关注。在当时人的宇宙观念中，味是由气直接生出，是气生味。音乐是以曲调为媒介，演唱时由人的口中发出，在先民看来，音乐演唱是以气生声，这与宇宙的以气生

味构成相互对应的链条，味和声都是生于气。正是由于二者具有可比性，因此，声和味被整理到同一系列之中，产生了“声亦如味”的命题。当然，这个命题的生成，也与祭祀礼仪有关。《礼记·乐记》写道：“清庙之瑟，朱弦而疏越，壹倡而三叹，有遗音者矣。大飨之礼，尚玄酒而俎腥鱼，大羹不和，有遗味者矣。”这里也是音、味并列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人们关注隆重祭祀的焦点在于音乐的典雅浊重，祭品的新鲜洁净。总之，声亦如味的命题，它的生成有哲学依据，又有祭祀文化的背景。

五行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，秀臣博士这部著作用多个图表做了说明。其中各种事物的系列搭配，有的看似很牵强，实际上仍然可以找到它的依据，从中可以看出礼书作者的审美体验。按照《礼记·月令》所做的编排，与宫音相对应的五味是甘，五臭是香。甘、香是人的味觉和嗅觉的快感，在五音中宫音最为浊重，这种搭配反映的是以浊重为本的审美理念，与羽音相对应的五臭是朽，这种搭配似乎很费解，但是也可以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。对于朽，郑玄注：“气若有若无为朽。”再看羽音，在五音系列中，羽居最末，最为轻清。清音易于散越，对此，《国语·周语下》有明确论述。声音散越则若有若无，故五行说把羽音与朽气相配。《礼记·月令》所出示的五行说体系，与中国古代元文学理论多有关联，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发掘的宝藏。

五

秀臣博士具有宏通的学术视野，这部著作论述《礼记》的元文学理论形态，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话题。可是，在具体论述过程中，能够对古今中外诸家之说多有参照和借鉴，从而使这部著作在理论体系建构方面能够居于学术前沿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。

孙康宜、宇文所安主编的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中译本刚问世，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就对其中的相关论述做了征引和借鉴，把海外汉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纳入书中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学术触角的敏锐。对于荣格的著作，国内学者主要是借鉴他的原型批判理论，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则是征引这

位学者有关象征的精辟论述，作为祭祀礼仪象征系统一节的理论支撑。在借鉴古今中外学者相关论述的过程中，这部著作的具体操作方式多有可取之处。作者不是生搬硬套采用贴标签的方式，而是根据所论问题需要，斟酌取舍，选择的对象均精当恰切。导论的开头一段援引美国汉学家柯马丁有关中国古代“文”的论述，最后落实到“文化核心从仪式性向文本性表达的整体转移”，而本书所要探讨的，正是礼的仪式性的表达。理论的援引借鉴与该书的探讨对象实现了无缝对接。

这部著作有的章节旁征博引，引文所占比例较大，但是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权威论断的罗列，而是有鉴别和辨析。第一章第三节提到“兴”与西方象征理论，相继援引周作人、闻一多、梁宗岱、梁启超诸家的大概论述，然后写道：“以上诸论揭示了‘隐’‘兴’和‘象征’的关联，却没有指出‘兴’和‘象’的实质，忽略了孔颖达‘兴必取于象’的理论提示。”“‘象征’的概念在中国确是‘古已有之’，只是中国的‘象征’多用于哲学的理性阐释，而文学中类似表述是‘隐’和‘兴’”。既肯定诸家对西方象征理论加以借鉴所具有的合理因素，又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为本位加以审视，指出诸家之说的不足，立论坚牢，给予的判断也很精辟。

如果对于书中所引以上诸家之说进一步加以审视，还会发现需要修正之处。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篇写道：“兴者，起也。……起情者，依微以拟议。”对于其中的“微”字，周作人、闻一多、梁启超诸先生均未涉及，唯有梁宗岱先生做了解释和发挥：

所谓“微”者，便是两物之间微妙的关系。表面看来，两者似乎不相联属，实则是一而二，二而一。象征的微妙，“依微拟议”这几个字颇能道出。

梁先生对于象征所做的解释大体不错，但是，把“微”释为微妙，却与刘勰的论述出现隔膜。“微”指微妙，这是它在后代的常用义，今人往往做这种理解。可是，“微”字在先秦时期的主要用法不是表示微妙，而是指隐蔽、掩藏，这类案例甚多。可是，由于后人对于它的这种古义已经疏远，

所以对先秦典籍往往出现误读。《九章·悲回风》写道：“物有微而陨性兮，声有隐而先倡。”王逸注：“言芳草为物，其性微眇，易以陨落。”王逸把“微”释为微眇，是用这个字在汉代的常见义加以解释，实属误读，却被后代所因袭。诗中是“微”和“隐”对举，“微”指的就是隐蔽。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篇出现的“微”，用的是它的本义，指的是隐蔽。这个案例表明，对于所援引的权威论断，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，而必须首先审视它的合理性、科学性，再做出准确的判断。

人在学术研究的开始阶段，犹如儿童学步，必须有所依托，而不能完全独立前行。援引权威论断，就是初学者的拐杖，绝大多数学人都要经历这个学步阶段。但是，学术研究必须进入独立前行阶段，到了这个时期，权威论断的援引就不应该局限于证成己说，而是要有所超越，要有词语诠释上的突破，要有理论上的创新，视野上的拓展和方法上的变更。如果不能走到这一步，就无法真正进入学术的殿堂，研究工作也不可能进入自由境界。《诗经·小雅·楚茨》是一首祭祀诗，最能体现礼仪与文学的关联，因此，《剑桥中国文学史》和秀臣博士这部著作都对它给予高度关注，做出专门的论述。《剑桥文学史》写道：

诗歌按祭祀次第展开，描写了担任不同角色的仪式参与者，并借助韵律变化以及其他形式手段，标示出了参与者各自的语言。结果是一个多声部的仪式戏剧剧本，以供在宗庙中上演。这样，《楚茨》文本不仅与祭祀活动相始终，又以颂美的语言永久保存了祭祀礼仪本身。

和国内多部影响很大的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相比，上面的论述确实很精彩，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以往有很大的突破。可是，《楚茨》所体现的礼仪与文学的关联并非只限于上述所论，而是还有许多重要的因素需要发掘。如果简单加以概括，起码还可做如下补充：祭祀尚敬的传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；祭神如神在的心理感受使作品带有神秘的色彩和人神之间的亲近感；祭祀的程序内化为文本的叙事结构；工祝的致告辞的四言句型成为四言诗篇的有机组成部分；前面三章出现的三句为一节的结构模式，保留